

傳習錄

十
講

何善蒙
編著



傳習錄

十八講

何善蒙
編著

本书获2015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本书获贵州省孔学堂发展基金会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习录十讲 / 何善蒙编著. —贵阳 : 孔学堂书局有限公司, 2016.7
ISBN 978-7-80770-061-6
I. ①传… II. ①何… III. ①心学－中国－明代②《传习录》－研究 IV. ①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2849号

项目策划：周之江
出品人：邓国超 李 筑
责任编辑：张忠兰 丁 羽
装帧设计：先锋创意
封面设计：唐光盛
版式设计：梁诗吉
责任印制：严德飞
出 品：当代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孔学堂书局
地 址：贵阳市乌当区大坡路26号
发行电话：(0851) 86277673
印 制：深圳市泰和精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16 787mm×1092mm
字 数：218千字
印 张：17.5
印 数：1-2000册
版 次：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70-061-6
定 价：49.00元

本书获二〇一五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本书获贵州省孔学堂发展基金会资助

序

善蒙老弟近有大作问世，取名《传习录十讲》，嘱我为序。我一看题目，眼前一片眩晕，我虽治理学有年，但一直视“阳明学”为“畏途”，私忖对阳明学只有学习了解的份，因此从来不敢置喙，至今无任何关于阳明学的文字发表。按阳明“格竹子”的说法，这就是“无他大力量去格物”。所以让我作序，真有点为难，但后来一想，觉得也无可。

大家也许发现，近年来“阳明学”忽然就吃香起来了。我一直以为，学者讲讲阳明也就算了，现在一些当官的也在讲、一些老板和白领也都在讲，这当然不是什么坏事，但总让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就好像前几年突然佛教吃香了，大家都去庙里烧香拜佛、打坐吃斋，一帮小知在那里嚷嚷什么“禅悦”“公案”“话头”……实际上统统狗屁不通！这么一想，与其让“山寨”的阳明充斥思想界，倒不如推荐一些路子较为正宗的说法，也可正视听。于是始敢下笔。

对宋明理学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阳明学本是应着“补偏救弊”而起的。孔子讲“学而时习之”、孟子讲“良知良能”（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实际不出孔孟的规矩），只是汉儒疏离了孔孟原旨，偏于“齐家”之方与“治平”之术，佛教东来后，“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上至读书人、下到平头百姓正心修身的资源，多被释老二家夺去了。于是有“北宋五子”为思想代表的儒者奋起回应，在儒家道德理性形上本体化，以及做人精神、人生

的信念上狠下气力与功夫。至南宋朱子学出而基本完成，但朱子也留了块短板，即儒家道德理性向主体性落实上没能点准、点透，于是就有陆象山（九渊）的反拨。但象山力量不够，于是在南宋中后期就出现了程朱之学的异化现象。如南宋周密的笔记《齐东野语》《癸辛杂识》中就非常生动形象地记载了当时所谓的“道学先生”的丑态（恕文长不录），这就与程子、朱子的本意格格不入了。

进入明朝，朱元璋宣称“本朝以理学立国”，于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朱子学彻底官学化后造成了思想文化的僵化和伦理道德的衰败。读书人奔竞于八股路上，作时文、求功名，大多成为百无一用的“冬烘先生”，就如阳明所痛斥的：“耳目眩瞀，精神恍惑”、“如病狂丧心之人”、“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这批人“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锦其伪也”（《传习录》卷中），是十足的“伪君子”“假道学”。

阳明早年曾笃信程朱理学，但按朱熹提出的“格物”方法他没有求得“天理”，而他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却又“士风衰薄”“病革临绝”，这使他逐渐对“朱学”由尊信到怀疑。几经磨难，苦苦思索，始悟“格物”之旨，遂走上“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心学”之路。他继承发展了陆象山的“发明本心”思想，以拯救“世道”“人心”为己任，把“天理”移入“人心”，将传统儒家的道德伦理建立在简易的哲学基础上。提出了“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具有深刻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新理学思想，克服了官学化了的程朱理学的繁琐与僵化，使理学重新获得了生机和活力。

阳明的思想是他经过了三十多年酝酿、磨难、充实、提高而

建立起来的，其间经历了所谓的“五溺三变”“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这些情况大家应是熟悉的，这里就不必多言。最后他是“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这“千古圣圣相传一点点骨血”，“圣门正法眼藏”或曰“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可是，在阳明本人那里清楚明白的思想，在阳明后学那里真得就和乃师一样清楚明白了吗？阳明后学中最厉害的两大人物王龙溪和王心斋尚且都有程度不同的背离，其他人就不必说了。所以劝对阳明学感兴趣的诸君认真了解，不要人云亦云的“耳食”。

善蒙君1996年入复旦哲学系本科，以优异成绩而直升硕士生，后又直升博士生，所以十年间他都在复旦哲学系问学。在我的眼里，善蒙勤奋刻苦，好学深思。从本科开始，他就对中国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关于王阳明的“心外无物”问题的讨论。在研究生就读期间，他对中国哲学领域有了更深广、更扎实的把握，尤契于在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中国传统宗教等领域。在完成博士学位后，善蒙进入浙江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在董平教授的指导下，学问又长进了许多，以后就留浙大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和古代宗教的教学和科研。

善蒙的这个稿子，我粗粗阅读一过，觉得除了前面提到的路子“正”这一点外，尚有些新的东西也值得琢磨琢磨。如：对其特别强调阳明学的重要价值在于现实生活世界重新建构的意义（参见其“活泼泼的生活世界”），即怎样使儒家的道德原则能够真正有效地落实在现实的经验生活之中的问题；如关于阳明《拔本塞源论》与陈荣捷先生的不同说法的问题；如关于阳明的“四句教”究竟怎么产生的问题……当然，这并不表示我就同意他的观点了，我只是认

为这些问题的说法或可激活一些新的想法，或可作为供读者诸君进一步参详的起点。

学生学有小成，这是我们做老师最乐见的。记得二十年前我的博士论文出版时，业师潘富恩先生作序，序末有“我很高兴看到我们青年一代学者迅速成长起来，我们的学术事业是后继有人的”！我就把恩师的话抄下来、传下去。

是为序

徐洪兴

2016年6月30日于复旦大学

目录

序

第一讲 朱子理学的问题与阳明心学的兴起

一 『道统』说与儒学复兴运动

二 从『朱陆之辨』看朱子理学的内在张力

三 从『格竹致知』到『龙场悟道』

第二讲 《朱子晚年定论》

- | | | |
|-----|-----------------|-----|
| 046 | 043 | 038 |
| 一 | 《朱子晚年定论》的编定及其风波 | |
| 二 | 朱子晚年真的改变了吗 | |
| 三 | 在辟朱和尊朱的夹缝中 | |

第三讲 心即是理

一心是什么

二 心是真己

三 心即是理

四 心犹镜

五 心之本体

第四讲 心外无物

- | | | |
|-----|------|-----|
| 098 | 092 | 084 |
| 一 | 什么是物 | |
| 二 | 格物新解 | |
| 三 | 心外无物 | |

第五讲

致良知教

174	168	162	158	151	145	140	138	134	128	123	121	118	115	109	104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四	三	二	一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本体即是工夫	事上工夫	心上工夫	什么是工夫	什么是本体	立言宗旨	良知笃行	知行工夫	知行本体	正人心，息邪说	良知是一把双刃剑	学问头脑	致良知	满街都是圣人	常快活，便是工夫	良知是什么
跋															

第七讲

本体工夫论

250	244	241	236	227	226	216	211	205	199	193	188	180
跋	四	三	二	一	五	四	三	二	一	四	三	二
	阳明晚年定论	王畿理解中的四句教	钱德洪理解中的四句教	仁爱与差等之爱	拔本塞源论	万物一体论	万物一体的思想渊源	常快活，便是工夫	乐是心之本体	活泼泼的生活世界	无入而不自得	良知有什么特点

第十讲

四句教

第八讲

活泼泼的生活世界

第一讲

朱子理学的问题与 阳明心学的兴起

儒学复兴之路由中晚唐的李翱开启，经北宋的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张载、程颢与程颐兄弟等的努力，基本完成了儒学转型，并奠定了理学基础，使理学发展初具规模。自朱熹出现，绍述程子，集理学大成，且在对抗佛老过程中，以理学形式确定了儒学复兴的基本面貌。然而一如陆九渊发现朱子理学存在的内在张力一样，阳明清楚地意识到朱子理学系统中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问题，而这成了阳明思想突破的基础和关键，在龙场悟道后，阳明最终以心即理的方式化解了朱子系统中存在的析心理为一的困扰。

肇端于中晚唐的儒学复兴运动，是儒学面对佛、道二教挑战的积极回应，而这种回应最终以理学形式完成。从思想形态上说，理学是在玄学思维框架基础上，再以佛教心性论作为有效载体，最终归于儒家仁义之道的一门学问，由此，三教融合在理学结构中是非常清楚的。儒学的复兴之路由中晚唐的李翱开启；此后，北宋庆历之际以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等为代表；北宋熙宁、元丰前后则以张载、程颢与程颐兄弟等为代表。这三阶段前后呼应、一脉相承。经他们努力，儒学转型的架构定型基本完成，并奠定了理学规模。自朱子出现，绍述程子，集理学大成，且在对抗佛老过程中，以理学形式确定了儒学复兴的基本面貌。

当然，就理学内部思想形态来说，通常有理学、心学、气学、性学等的划分，而理学和心学无疑是最具有影响力两种形式。从回应佛、道二教挑战的意义来说，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是宋明儒者有意识回应佛、道复兴儒学的结果，而朱陆之争的出现，则表明两者在具体的回应方式上存在着差异。朱陆在尊德性和道问学方法上的差异极为明显，而方法上的差别则由两者所设定的本体所决定。若本体为心，所以必要先立乎其大，必尊德性为先；若本体是理，就须不断求学，道问学的方法最为重要。由此，陆学呈现出来的基本格局和朱子学就不一样。由此，心学传统在南宋时期亦得以确立。当然，陆九渊心学是直接针对程朱理学存在的问题而来的。

一如陆九渊发现朱子理学存在的内在张力一样，阳明也清楚地意识到朱子理学系统中存在着难以调和的问题，而这成为了阳明思想突破的基础，在龙场悟道之后，阳明最终以心即理的方式化解了朱子系统中存在的析心理为二的困扰。朱子学的内在问题，是阳明实现思想突破的关键，从这个角度来说，阳明学是在朱子学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一、“道统”说与儒学复兴运动

在正式讨论阳明心学和《传习录》之前，我们首先要看的是阳明心学这种思想是怎样产生的。这就需要回到宋明理学的背景中去考察，阳明心学就是在理学发展的脉络中出现的。

关于理学的出现，我们经常会提到“道统论”。如果从历史的演变来考察，差不多从南宋开始，“道统”这个词就经常在文献中出现。“道统”是什么？如果我们看一下“统”是什么意思，就大概可以知道提出“道统”的针对性意义。按照许慎的《说文解字》，“统者，纪也”，也就是纲纪的意思。郑玄在注释《周易》中“以统天”的时候，把“统”解释为“本”。何休在注释《春秋公羊传》里的“大一统”时，把“统”解释为“始”。无论是“纪”“本”还是“始”，说的都是最原初的根据、头绪的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说，“道统”最为直接的意思就是对道的基本传承方式和存在方式的追寻、梳理。因此，如果说理学的兴起是与道统说密切相关的话，那么理学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对于儒家之道的重新梳理和发展。

从目前文献的考察看最早提及此问题的是朱熹，朱熹在很多地方都提到儒家道统问题：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中庸章句序》）

朱熹在他的很多著作中都谈到了儒家道统传续的问题，而《中庸章句序》则最早使用了“道统”这个词，并且也最完整地陈述了儒家道统的内涵。首先，在朱熹看来，儒家也是有非常明显的道统传承系统的；其次，儒家的这个道统传承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王道政治传统延续下来的，为孔夫子所承继；第三，孔夫子在“道统”的地位中是继往开来的，尧舜是开端，但是孔夫子是继往开来，更重要的是，从孔夫子开始，作为政治传统的圣人之道和圣人之学便结合在了一起；第四，儒家道统的内涵是什么？朱子很明确地提出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也就是所谓的儒门十六字心法，所谓心法，实际上就是圣人之道，虽然对这来自于《大禹谟》的十六字心法有很多争议，然而自朱子提出这个作为儒门

心法之后，这几乎成为整个理学传统的共识。这种情况大体和儒学需要抗衡佛、道为代表的异端，与必须以最清晰的形式表达自身的价值立场的这种需求有密切关系；第五，在孔子之后，只有颜回和曾子得其宗，也就是承续了道统。孟子继承了子思的传承，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思孟学派。到孟子之后，儒家的道统就断了，儒学淹没在异端之中，儒家之道由此而不明。但是因为儒学经典的存在（这里主要指《中庸》而言），二程兄弟得以接续“道统”，重新昌明儒家之道。这是朱熹对“道统”流传的基本看法，也代表着狭义的理学（即程朱理学）的基本道统观念。

当然，虽然“道统”一词是朱熹最早提出来的，但是道统的观念并不是从朱熹这里最早就有的，这个观念最早出现在韩愈那里，韩愈由此也被视为了理学复兴的先驱，按照韩愈的看法：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

韩愈的说法，和朱熹前面的说法稍微有点差别，但总体上都是认为“道统”在孟子之后没有传承了，所以才会有在韩愈以及二程朱熹时代，会被严肃地讨论。为什么理学要讨论“道统”问题？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就会发现通过理学传统最终所确立起来的儒学道统（不管是心学的，还是理学的），有很多所谓的传续过程，并不一定就是历史事实（比如早期的传续过程，甚至是在宋初，尤其是二程与周敦颐之间的承续问题），如果道统不主要是历史事实的描述，那么道统的意

义是什么？也就是说，从理学家对于儒家之道的理解角度来重新建构一个所谓的传承系统（这个系统更重要的是基于对儒学价值的确认，而不是儒学历史脉络的呈现），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为什么理学家要建构起一个儒学道统？

这必须要和理学的兴起所面临的特殊背景联系一起来思考，理学的兴起是受到很大刺激的，这与唐代以来中国思想和社会的基本事实有着密切的关系，简而言之，儒学在汉代开始具有的独尊地位经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变革已不复存在，佛、道两教（尤其是佛教）给儒学带来了非常大的刺激，这种刺激在北宋中期的王安石那里，还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荆公王安石问文定张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而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岂为无人；亦有过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马祖、汾阳、雪峰、岩头、丹霞、云门。”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安石欣然叹服，后以语张商英，抚几赏之曰：“至哉，此论也！”（释志磐《佛祖统纪》）

这一段王安石和张方平之间的对话，非常直接地反映出儒学和佛教在唐以来的基本关系。王安石跟张方平说孟子之后就没有醇正的儒家了，张方平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孟子之后是有人的，而且这些人甚至超过孟子。王安石就马上问是哪些人，而张方平回答的都是些中晚唐以来的禅宗高僧。为什么如此？“儒门淡薄，收拾不住”。这是张方平所给出的最为有力和最为直接的解释，恰恰可以很好地描述中晚唐基本的社会状况。这个状况就是儒门淡薄，收拾不住人心，所以唐代出名的儒家很少，不是佛教就是道家，家喻户晓的李白就属

道家，王维、白居易属佛教，从唐代的基本社会和思想状况来说，儒门淡薄，确实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所以，从上面这段宋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因为佛教的兴盛和强大，使得儒家丧失了它应有的地位，这种状况引起了儒家学者的忧虑，于是就有了儒家的复兴运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的复兴运动，首先应对的就是佛教的刺激和挑战。

所以，儒学的复兴运动是极其有针对性的，就是为了应对佛教的挑战，那么，佛教所带来的挑战有哪些方面？佛教给予当时学者最为直接的印象首先是佛教制度极其完善：

自佛行中国已来，国人为缁衣之学，多几于儒等。然其师弟子之礼，传为严专。到于今世，则儒道少衰，不能与之等矣。于其流亦有派别焉。为之师者，量其性之高下而有授说。（沈亚之《送洪逊师序》）

按照韩愈的弟子沈亚之的上述说法，佛教传入中国，之所以有极其迅速、强大的发展，并同时导致儒学衰落，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师弟子之礼，传为严专”，即佛教有着严格的制度，其传承关系十分严密。这种制度使得佛教比儒学在当时中国发展更好，佛教传承清晰，而且在传承过程中，非常有针对性，所以儒家无法和佛教抗争。这个观察应该说还是比较中肯的，如果我们去考察佛教在当时的传播，尤其是所谓的八大佛教宗派形成之后，它们内部的制度非常完善，有着严格的法脉传承制度，例如五祖弘忍传给六祖慧能（虽然有人说这是慧能之后神会建立起来的），但是至少佛教是有意识地在创造这种传法系统，这是一种很好的制度性保证。其好处也非常清楚，既可以保证其所传的乃是正法（正统性、权威性），又可以形成不间断的传